

民族主义风潮中的《一千零一夜》

宗笑飞

内容提要 《一千零一夜》在18世纪初被翻译成法语后，为欧洲文学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型提供了契机和素材，众多移译本对东方国家的形塑也契合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乃至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需求，而它回归东方的过程，也无疑体现了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本文不仅回溯了这一过程，并对它在阿拉伯世界重生的诸多面向进行呈现与分析，同时对其中应注意的问题陈述了一得之见。

关键词 《一千零一夜》 民族主义 他者 异质 抵抗式书写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21.02.008

三百多年前，一位法国人得到了几卷在阿拉伯世界尚默默无闻的手稿。那时，巴黎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就像条条河流渐次汇入波涛汹涌的海洋：法国大革命。文化沙龙既是思想碰撞的场所，也是法兰西生活的时尚。名流荟萃的女性沙龙更使各色文人流连忘返。这位法国人的东方故事在沙龙里受到了狂热追捧。不惟女性，就连男士们也为这些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故事着迷。受此鼓励，他一鼓作气，用了几年时间将三卷手稿全部翻译成了法文，并于1704年至1713年全部付梓。他便是第一位将《一千零一夜》（以下简称《夜》）译为欧洲语言的安东尼·伽朗（Antoine Galland）。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他赋予了《夜》重生的机会。

一、西行，西行

三百年后，博尔赫斯几乎逐字逐句地将

《夜》中的一些故事搬进了他的小说，是谓《双梦记》和《铜城故事》。这是两个关于“他者”的故事。从翻译学的角度看，伽朗犹如林纾，其译文未必精准，充其量只能算是编译，甚至改写，但从所产生的效应和影响来看，他无疑是成功的。当时的法国文学乃至欧洲文学，正从古典主义大踏步走向浪漫主义，伽朗译本所呈现的阿拉伯世界的异域色彩、东方风情，以及奇幻的魔法世界，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人的想象提供了一个万花筒，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从而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系——“他者”。这也是《赵氏孤儿》（1731年译成法文，之后由伏尔泰将其改编成《中国孤儿》）紧接着传至法国和英国的重要原因。萨义德总结的东方主义开始在欧陆扬帆起航。

显然，伽朗的意译使他笔下的《夜》染上了浓厚的法兰西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象。那也是他的志趣。遇到能够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夸

张情节,他必浓墨重彩,尤其是最为著名的《阿拉丁神灯》、《辛巴达航海》、《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在他留存的三卷手稿中是阙如的)。据他所言,那些故事在他稍后获取的第四卷手稿中,但这份手稿始终没有被发现。无论出处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夜》译本的问世已经掺杂了欧洲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甚至迎合了建构西方中心主义的需要。也就是说,它在欧洲问世之初,就是作为“他者”被表述的,并且是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产品被表述的,其形塑空间虽不能等同于欧洲文学对“他者”的直接表述,但也比严格的翻译作品放大了许多。有学者认为,伽朗的所作所为从一开始——包括随后出现的《夜》的接受——便伴随着法兰西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这也是《夜》接受史的一个重要特征。^①在他之后,各种译本层出不穷,有些改写甚至比伽朗更甚。据粗略统计,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仅欧洲的《夜》译本就多达近百种。总之,《夜》的西行本身就是有效的文化迁徙。西方在这一“异质”文化背后既看到了神奇,也看到了机会——那便是马克思所说的西方殖民东方的“双重使命”。^②

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欧洲掀起了以《夜》为显性或潜性范本的创作热。鉴于女性对东方的想象异常痴迷,关于白人女性和“摩尔人”情感纠葛的传奇故事大量涌现。其中有佩内洛佩·奥宾(Penelope Aubin)的小说《高贵的奴隶》(*Noble Slaves*, 1722)、《夏洛特·杜朋的一生》(*Life of Charlotta Du Pont*, 1723)等,他的作品大多采用类似《夜》的框架结构。18世纪后半叶,伊萨克·贝克斯塔夫(Issac Bickerstaff)的《苏丹》(或曰《土耳其后宫一瞥》, *The Sultan; A Peep into the Seraglio*)、艾丽莎·海伍德(Eliza Haywood)的《审查无果》(*The Fruitless Enquiry*, 1727)、伊丽莎白·玛莎(Elizabeth Marsh)的《女俘》

(*The Female Captive*, 1769)、罗伯特·巴吉(Robert Bage)的《公平的叙利亚》(*The Fair Syrian*, 1787)、哈奈·考利(Hannah Cowley)的《土耳其一日》(*A Day in Turkey*, 1792)等等,其基本内容皆为白人女性在东方伊斯兰世界或与其相关的生活情景。这进一步反映了《夜》译本在欧洲出现后,其对欧洲文人及女性猎奇心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夜》为当时西方列强提供了浪漫灵感,也为诗人提供了创作素材。比如华兹华斯、索锡、柯勒律治、雪莱及拜伦等,都曾表现出对《夜》的钟情。随着英国东方学的逐渐升温,他们的诗歌创作也不断攫取“异质”想象。同样,法国小说大量借鉴这部古老的东方故事集,有关作品蔚然成风。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1721)中东方想象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优美,其对东方社会以及宫廷生活的奢靡习俗和华丽宴席的描述明显受到《夜》的影响。伏尔泰的作品《穆哈默德》(1742)、《查第格》(1747)等也体现出他对《夜》的钟爱。有些文人在仿写的同时还尝试演绎自己的《夜》,比如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的作品《瓦瑟克》(*Vathek*, 1782)被翻译成英文时,即以《阿拉伯故事:源自未出版的手稿》(*An Arabian Tale, From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命名,及至20世纪才以原书名再次面世。他还直接借用《夜》的故事,这些故事被收录在《瓦瑟克外传》(*The Episodes of Vathek*)中,后者直到20世纪才得以出版。与此同时,他还陆续翻译了英国作家和旅行家爱德华·沃特雷·蒙塔古(Edward Wortley Montagu)收集的《夜》抄本。19世纪的许多欧洲游记文学更是离不开这部故事集所赋予的灵感。

回眸18至19世纪末的西方史,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转型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强烈的民族(种族、文化)认同使得他们越来越清晰地建立起自我与“他者”的形象区分。为了“西

方身份”认同，东方形象开始成为一种需要，而《夜》的不断翻译、改写满足了前者的形塑需求。

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夜》对构建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理解，可谓意义非凡。法特梅·穆萨(Faṭimah Mūsā)曾在一篇文章中援引詹姆斯·库伯(James Cooper)的话，认为19世纪的人们“要想前往亚洲旅行，阅读《夜》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③他在这里大而化之，竟然将话锋指向了整个亚洲。而这个“亚洲”又如何呢？无非是《夜》所呈现的东方世界：充满了声色犬马、集权统治、魔幻怪诞、性感十足等诸如此类的画面。当福楼拜带着脑海中经由《夜》所构建的华美东方世界踏上真实的阿拉伯领土时，他心中也便充满了失望和悲凉，因为这和他脑海中由传说构建起来的认知简直千差万别、形同霄壤。阿拉伯的劳伦斯也是显证。曾几何时，有多少欧洲青年是在阅读了《夜》后满怀激情和渴望进入真实的东方世界啊！甚至一直到1919年，谋求叙利亚建国的费萨尔在参加完巴黎和会后也不禁慨叹“西方人对阿拉伯人知之甚少，其信息全部来源于《夜》的传说。”^④此言不算夸张，当时的欧洲人对于真实东方的了解，非常有限，而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恰好成为他们完成“双重使命”的理由。此外，包括《夜》在内的许多东方文学作品，都对帝国边界进行过或多或少的界定，其中的“他者”形象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刺激作用，甚至演化成了西方列强开启帝国征服进程的催化剂。对于西方诸公，阿拉伯世界和亚洲的想象基本定格于“非理性的、幼稚的、堕落的东方”（萨义德语），这使得他们产生认同并由衷地衍生民族（种族、文化）优越感，甚至为帝国的征服找到了正义性——如此“东方”，急需他们去祛除野蛮、传播文明，而征服的结果，正是他们建立帝国（完成“摧毁”和“重建”这个“双重使命”）的过程。“在

英格兰和法国，《夜》译本被视为了解古代波斯帝权荣光的说明书，刺激着尚在成长中的欧洲帝国将自身与古老的亚洲帝国作比较。理查德·伯顿在他19世纪的移译本序言中，就曾对此直言不讳“英格兰总是忘记自己如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穆罕默德帝国。”^⑤也就是说，英国人已经忘记了它在推行所谓的文明传播、祛除愚昧的过程中，恰恰重复了古代东方（波斯、阿拉伯）那充满了征服欲望的霸权行径，而这些都在欧洲文人对《夜》的接受中有所体现。

二、回归与重生

与在欧洲成为众多西方文人创作灵感源泉的高光形象适成反差的是，《夜》一直要到一个世纪后（19世纪）才姗姗归来，结束它在东方文学殿堂阙如般寂寂无闻的暗淡时光，并且必得在两个世纪后（20世纪）才能迎来它在阿拉伯世界的涅槃重生。这一艰难过程的背后，体现了阿拉伯思想界和文学界自东向西、再由西向东的转变，其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在经过沉重的挪移和反思之后，有望走向超越二元对立的面向。

《夜》向东方的回归是个漫长的过程。吸收了这部故事集前二百多夜故事的东方印刷本，最初是由东印度公司威廉堡学院赞助，于1814至1818年在印度出版的，也就是今天所知的加尔各答版本，而第一部埃及本土出版的《夜》（两卷校勘本）一直要到1835年才得以面世，史称布拉克本。并且，几乎整个19世纪，阿拉伯世界对《夜》的关注似乎仅止于布拉克本。

19世纪上半叶，新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已经出现，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尚未形成。面对西方殖民帝国的渗透和阐释，阿拉伯世界更加关注自身的积弊，孜孜汲汲地学习西方，试图跟上西方工业革命和思想潮流。在文学领

域尤其如此,西方的创作手法、创作技巧被奉为圭臬。20世纪初,阿拉伯世界出现了现代小说。这个“现代”,所指便是西方文学对小说的新价值判断和审美界定,具体说来是拥有西方小说所包含的元素。而当时的阿拉伯人没有意识到,西方小说的产生本身就受到了不少包括阿拉伯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元素的滋养,这其中也包括《夜》。但是,对那时的东方世界而言,摒弃自身、来者不拒地接受西方文明便被视为进步。这一时期,也曾有人将《夜》的故事改编为戏剧,在私人剧院上演,但并未引起反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越来越清晰,女权主义运动作为对民族主义的支持也开始出现。苏海勒·卡拉马薇(Suhair al-Qalamāwī)便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她是埃及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其写于1935年的博士论文《论〈一千零一夜〉》(1943年第一次出版)被视为阿拉伯世界第一部全面研究《夜》的学术著作。虽然比较浅显,但她已经能够自如地运用当时的西方文学理论,即借助本文细读,从社会伦理、形象归类等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尤其重视其中的历史元素。这是阿拉伯世界《夜》研究的滥觞。她在该书“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一章中指出,《夜》中的女性“并不是从女性的角度创造出来的”,^⑥这个观点敏锐地体现了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仿佛是波伏娃“第二性”理论和福柯“环形凝视”理论的和声。女性作为第二性,是被表述的,被男权话语——说书人——世代代按照自己的想象建构和形塑出来的。因此,她们的形象是男性心目中的类型化形象——“他者”:要么狡黠奸诈、诡计多端,给男性带来灾难;要么聪慧机敏,救男性于水火;要么贤淑温婉,是贤妻良母,等等。因此,她总结说,《夜》的女性人物是类型化的,是“‘这一类’,而非‘这一个’”。^⑦“这一个”的说法无疑典出歌德。同时,卡拉

马薇还敏锐地指出,伯顿的译本满足了欧洲了解东方的迫切需要,并且一定程度上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倾向。

20世纪40至60年代末,阿拉伯民族主义进入繁盛时期。在纳赛尔主义及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伟大政治时代,特别是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由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影响,左翼思潮开始形成,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著名的60年代辈作家。他们开始意识到寻求民族特质的重要性,从而对《夜》的民族自觉油然而生。由此,《夜》才真正开始了它的重生之旅,并被不断赋予新的审美价值。

不得不说,新生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历程充满坎坷。从漫长的谋求独立时期,到1948年的巴勒斯坦危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昙花一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短暂璀璨,及至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何啻一波三折。埃及萨达特上台后,阿拉伯国家相继转换阵线,各种西方思想激荡涌入。面对腐败、集权、贫富悬殊、宗教极端势力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阿拉伯文人几乎无暇惶惑。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忧虑,并奋起批判。与此同时,他们反思西方思潮,避免在不断“拿来”的过程中丧失自我,丧失文化独特性。于是,强化自身民族身份认同成为这一时期阿拉伯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共同使命。他们运用传统文明素材,进行抵抗式的书写或反书写,并将其视为身份抗争的一种方式。而《夜》无疑是人们心目中活力四溢,也是他们美学体验和政治灵感的艺术源泉。以下且以几个文本为例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夜》被再书写的几种类型。

1. 身份抵抗叙事作品中出现的《夜》

巴勒斯坦小说家伊米勒·哈比比(Imil H abībī 1921 - 1996)的《乐天的悲观者赛义德·艾比·奈哈斯失踪奇案》(1974),其英译本名为《赛义德的秘密生活:悲观者》(The

Secret Life of Saeed, the Ill-Fated Pessoptimist, 简称《悲观者》) 被一致认为是阿拉伯小说的一次重大突破。这部小说通过现实与幻想、悲剧与喜剧的杂糅, 讲述了一位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公民的荒诞境遇。主人公是一个喜剧式英雄、不幸的“傻瓜”, 他为了生存, 成为告密者。在经历一系列灾难后, 面对现实, 他又被迫成为只希望“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边缘人物。哈比比的这部作品想要阐释的是在苦难之中, 侵略和抵抗、恐怖主义和英雄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矛盾纠葛。他从《夜》中汲取灵感, 借用《夜》的对话策略、主题和机巧, 通过互文性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 将现实与奇幻融会贯通, 不仅建构了一个充满想象的自由世界, 而且旁逸斜出, 展示了后殖民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哈比比以此揭示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流离失所或成为少数族裔的巴勒斯坦人的惨痛经历。黎巴嫩批评家伊利亚斯·胡里(Ilyās khūrī) 指出, 《悲观者》中关于叙事结构、叙述者、语言和故事的重复率、循环率, 是对包括《夜》在内的阿拉伯民间文学叙事技巧的戏谑性模仿。我国学者余玉萍也曾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 认为《悲观者》对《铜城故事》等进行了戏仿。

伊利亚斯·胡里本人也是挖掘民族文学传统《夜》的践行者。他在许多小说中都运用了循环叙事结构。叙述者的讲述沿着某个线索循序渐进, 并不断隐喻山鲁佐德这个角色。同样是关注 1948 年巴勒斯坦危机, 他的小说《太阳之门》(*Bāb Ash - shams*, 1998) 被认为是循环叙事创作的巅峰之作, 曾入选 20 世纪 105 部最佳阿拉伯小说。为了创作这部小说, 胡里走访了位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的数十个难民营, 收集了许多活生生的流散故事。小说中, 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战士尤努斯躺在贝鲁特医院, 不省人事, 由一名亲子般的同伴照拂, 后者不时地给尤努斯讲述亲身经历。这个讲述者就像《夜》的女主人公山鲁佐德

那样, 是为了运用语言的治愈性功能, 来触发记忆、延缓死亡。同时, 小说还采用《夜》的经典嵌套叙事结构, 这使得读者很容易联想到那些古老的故事。胡里借用这种传统形式, 将故事编织得像故乡一样宽广, 以期为离散和失根的人们构建一个记忆和发声的空间, 从而保存那些被“异质”认知体系边缘化和遗弃的碎片, 进而实现民族记忆的延续, 使漂泊的灵魂得以安息, 使沉默的真实可以继续流淌。在许多阿拉伯文人的作品中, 《夜》便是如此和现实结合, 并被用来作为抵抗性叙事的契机、表达作者的反殖民主义立场的。

许多诗人, 如尼扎尔·格巴尼等, 也在诗歌中运用《夜》的元素, 通过神话再现进行身份抵抗式书写。诚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 抵抗叙事对于巴勒斯坦民族斗争至关重要。当然这种抵抗性叙述也有值得警惕的一面, 本文结语处将就再稍作论述。

2. 被左翼作家赋予民族、政治寓言含义的《夜》

纳吉布·马哈福兹视《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他曾说, 当他摆脱了儿时对《夜》的观感之后, 便发现这部作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梦境, 所有这些再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而被视为他象征主义创作巅峰的《千夜之夜》(*Liyāli Alif Lailah*, 1982) 便是从民族记忆、政治寓言的角度续写这部古老传奇故事的力作。小说没有采用嵌套式叙事结构, 而是用线性叙事讲述了国王山鲁亚尔在听了三年的故事之后, 愿意娶山鲁佐德为王后。同时, 山鲁佐德却担心国王依然戾气未除。卫队长贾木沙·白勒迪由于杀死贪官, 被国王判处死刑便是例证。死者以不同身份重生, 见证了国家的腐败、官员的贪婪和人类在各种欲望的交织中苦苦挣扎。国王在意识到自己的误判之后, 为了表示悔意, 他微服出巡, 直至最后阴差阳错, 失去了山鲁佐德。在小说中, 辛巴达、阿拉丁、祖贝黛、努

尔丁、脚夫等《夜》中人物纷纷登场，他们承担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和使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各色问题如黑暗和暴力。这使得这部小说充满了政治寓言色彩，见证了马哈福兹在一系列中东战争失败后对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社会种种弊端所进行的反思。他曾说，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的西化造成了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人们考虑的是不择手段、在短时间内聚敛钱财，却对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毫无顾忌”。同时，他认为“要使埃及摆脱危机，必须依靠民主和对话”。这些都在《千夜之夜》中所有反映。借助它，“我表达出了自己的基本关怀，我想尝试的是融合‘政治的现实’与‘形而上的思考’，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为‘苏非神秘主义思考’”。

学者欧阳文津认为，马哈福兹在他的这部小说中对《夜》的改写根植于当代阿拉伯现实及其社会背景，是为了建构某种政治寓言，关注权力的本质，以及权力附带的责任。小说通过奇幻世界与政治寓言的纠缠，达到一种对民族—国家意向的重塑，或谓想象共同体的形塑。欧阳文津援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观点，认为《千夜之夜》模仿民族主义者的论调，想象了一个充满痛苦和血腥的世俗化和民主化共同体，它始于权力的人性化，终于权力的普罗化。马哈福兹的小说不仅从思想层面对政治当局进行表征，而且为民族—国家提供了诊断和预后。伊拉克学者法尔雅勒·嘉博里·贾祖莉(Faryāl Jabūrī Ghazzūl)在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千夜之夜〉：一部政治寓言》(Naguib Mahafouz's *Arabian Nights and Days: A Political Allegory*)中，也将这部作品视为马哈福兹的政治寓言：对社会现实进行的反抗式书写。它“无疑是一部政治小说，但其所包含的政治信息富有争议性，以至于使寓言变得更加复杂、晦涩”。她还补充说，“马哈福兹运用非框架性故事，使这些

看上去杂乱无章的角色和故事指向了70年代埃及的社会现实。那时新的私有化和利润至上的经济政策打破了社会神话，颠覆了人们的道德准则。”当然，此类研究还有不少，在此恕不赘述。

在左翼思潮影响下，埃及产生了著名的六十年代辈作家，其中许多人还曾师从纳吉布·马哈福兹。他们秉持社会主义理念，从民族、社会公正等角度思索阿拉伯国家的未来，并以象征手法，从传统文学元素中挖掘写作素材，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哲迈勒·黑塔尼(Jamāl al-Ghaiṭānī)。后者自幼喜爱《夜》，在后来的创作中也反复从中挖掘创作元素。在《彷徨集》(*Ḥikāyāt Hā'imah*, 2014)中他就曾表示，他一直想写一部《夜》那样的作品，而《彷徨集》部分实现了这一梦想。事实上，他的许多早期作品已经体现出对这部古代阿拉伯故事集的重视和借用，并藉象征手法反思埃及当代政治生态。

3. 叙事结构和跨文本视域中的《夜》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虽然阿拉伯世界作为政治理念的民族主义已经衰落，但作为身份认同的民族主义依然存在。许多阿拉伯作家都在孜孜不倦地尝试用《夜》的元素来表达反抗性叙述乃至反叛性阅读。这其中比较经典的有阿尔及利亚诗人拉什德·鲍杰德(Rashīd Būjadrah)的法语小说《1001年的怀旧》(*Les 1001 Années de la nostalgie*, 1979)，以及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夫的三部曲之一《黑土地》(*Ar ḍ as-Sawād*, 1999)等。后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代表海上辛巴达和陆地辛巴达两个人物，巧妙地通过他们对抵抗性叙事主体和主题进行转换，来丰富《夜》的叙事潜能。

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还有一些阿拉伯文人尝试对《夜》和山鲁佐德、山鲁亚尔的框架故事进行改编，以丰富自己的叙事模式和表达技巧，尝试进行跨文本书写。比如黎巴嫩小说家拉希德·达伊夫的《任性的梅丽尔·

斯特里普》(*Tistifil Meryl Streep*, 2001), 就曾借用《夜》篇首的框架故事, 将山鲁亚尔描绘成具有强烈偷窥欲的人物, 以增添主人公的性困惑。拉希德有意展示偷窥癖、男性审视、阴谋和伪善等主题, 借此强化女性(“他者”)的大男子主义进行批判。不惟如此, 有些阿拉伯文人还将《夜》作为次生文本, 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这些都是对传统文学审美价值进行显性互文和深度挖掘的表证。

4. 20世纪50年代后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夜》研究

《夜》在当代阿拉伯文坛是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 这使它得以延展生命的长度, 而20世纪中叶以来阿拉伯学界对《夜》的研究又使得它获得了生命的厚度。这些研究或从思想和政治寓意出发, 研究它在当代民族语境以及文学创作中的新涵义; 或是运用现代批评方法和研究理论, 从叙事学、故事形态学等角度出发, 重新挖掘这部古老故事集的叙述方法和审美价值。本文攫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著述以示尊重。

1962年, 法鲁克·赛义德(Farūq Sa'īd) 在他的开创性著作《〈一千零一夜〉的启示》(*Min Wa ḥyī Alf Layla wa Layla*) 中, 梳理了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接受情况, 其中涉及艺术、音乐、戏剧、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及儿童文学等多个领域。他的研究和卡拉马薇的著述一样, 被视为有关《夜》的基础性研究。

1978年, 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了他的《东方学》。东方学为什么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具有如此深远的文化和政治魅力? 萨义德的答案是: 东方学既让人们看到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 也给出了西方建构“东方”的方式: 即欧洲人怎样站在自身立场和需要表述和形塑“东方”, 而《夜》在这两个世纪中恰恰增强了欧洲认识“东方”这个“他者”时所需的差异感和优越感。《东方学》

太具影响力, 它的主张已经深深地渗入当代学术研究的理论和认知, 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现当代阿拉伯世界以外的东方研究。同时, 它也成为阿拉伯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参照和警示。许多学者开始带着新视角研究《夜》, 其中穆斯塔法·阿卜杜·阿尼(Mu ṣ ṭafā Abd al-Ghinī) 的《现代阿拉伯思潮中的山鲁佐德》(*Shahruzād fi al-Fikr al-Arabī al-Ḥadīth*, 1985) 便在法鲁克·赛义德的基础上, 对这部故事集在1980年代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究, 其独特之处在于指出现代阿拉伯文学对山鲁佐德的接受主要分布于三个领域: 浪漫主义、抽象派及民族主义。穆斯塔法本人作为一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对最后一点显然格外兴致盎然。从这三个角度出发, 他重新评估了法鲁克·赛义德所讨论的一些作品, 并且对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千夜之夜》进行了新的分析。从思想性、民族性和政治隐喻角度研究马哈福兹的论文亦不在少数。

也有学者从文学功用、叙事学以及西方当代批评方法对这部故事集进行了探究。穆赫辛·贾斯姆·穆萨维(Mu ḥ sin Jāsim al-Musawī) 的《进入魔幻圈: 1704—1910 英国文学批评视野中〈一千零一夜〉》(*Al-Wuqū' fi Dā' irah as-Si ḥ r: Alf Layla wa Layla fi an-Naqad al-Adab al-Injīzī 1704 - 1910*, 该著原为其英文博士论文, 1987年出版阿拉伯语版) 为当时的阿拉伯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向度。这部作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 着重关注《夜》在英国文学中的传播; 此外还从叙事功能, 尤其是现代阿拉伯小说中叙事角度的多元性方面来探讨山鲁佐德的地位及其叙事方式对当代阿拉伯小说的影响。该专著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对《夜》的研究趋势做了总结和分析, 也谈到了欧洲人是如何从全知视角来塑造东方世界的。穆萨维的这部专著被视为当代阿拉伯《夜》研究的一块基石。上文提到的伊拉克学者法尔雅勒·阿祖莉也著有两部英文版研究专

著,分别为《〈一千零一夜〉的结构分析》(*The Arabian Nights: A Structural Analysis*, 1980)和《夜间诗学:比较语境下的〈一千零一夜〉》(*Nocturnal Poetics: The Arabian Nights in Comparative Context*, 1996)。她被认为是最先运用当代西方批评理论来研究《夜》的学者之一。这两部著作不仅借用中世纪阿拉伯美学和诗学理论,并且大量借鉴西方现代批评方法,如神话学和民俗学、寓言学和喜剧学,甚至后现代批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和故事形态学等,阐释《夜》的独特魅力。法尔雅勒考察了《夜》的故事形态,揭示了框架故事和框架叙事循环的辩证关系,并对各种叙事形式——民间史诗、动物寓言、辛巴达航海和恶魔故事等进行分门别类,同时将其与印度、欧洲和美洲的叙事作品进行比较。

20世纪末至今,阿拉伯世界对《夜》的研究、仿写或反书写仍在继续。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历史语境或宗教语境下的《夜》。譬如穆赫辛·贾斯姆·穆萨维的又一研究成果《伊斯兰语境下的〈一千零一夜〉》(*The Islamic Context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2009)从全球化视野出发,探讨这部古老作品中的伊斯兰元素以及与伊斯兰帝国兴衰的关系。

结 语

从《夜》再次进入阿拉伯创作视域开始,到大量学者对其进行日益深广的开掘,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回归和重生过程同样受到了西方政治和学术的巨大影响,并且与阿拉伯国家自身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交叉缠绕。一方面,东方学的产生不仅帮助西方在想象中构建了东方这个“他者”,也使得《夜》这部悠久的历史集在东方世界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几可谓涅槃重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这一接受和研究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在西方的刺激下踽踽前行的,因此它的重生很大

程度上是一个由仿西方走向反抗式书写和阐释的过程。这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局限,值得深思和警醒。比如,虽然有学者关注欧洲在移译和接受《夜》的过程中对东方有“异质化”和“他者化”想象,如拉伊德·穆罕穆德·努里(Rā'id Muhammad Nūrī)从伽朗、莱恩和伯顿这三人的译本出发进行分析,将三者分别对应欧洲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从古典至浪漫主义”、“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到帝国主义”这三个阶段,并认为作为不同阶段欧洲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三位译者均向各自所属的阶层展示了它们所需之《夜》”。但总体说来,类似研究须不断深广方能建构知识谱系。

萨义德曾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敏锐地指出,如果在思维上不能做到保持距离,而只用殖民和帝国主义的话语体系来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那么其结果只能陷入悖论式的泥潭。如果不能跳出二元对立的窠臼,许多反殖反帝势力所造就的政权则依然是殖民和帝国的范式。从所谓东方学的产生,以及欧洲对东方的想象和形塑,再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种“他者”的构建过程,其结果(或目的)正是为了设置差异和鸿沟,建立优劣性的二元对立。在文明领域也是如此,如果不能看出文明冲突论背后所体现的政治和利益的本质冲突,那么一切抵抗式反书写也只能陷入另一种树立优劣、制造差异怪圈的恶性循环,依然会被一种缺乏独立思考而建立起来的逻辑原则所掣肘。对《夜》的研究和仿写也是如此。当然,这并非说我们不能借鉴西方,而是要强调无论从民族主义时代、后殖民思潮,还是反集权政治的角度或扑面而来的各色西方理论出发,都应该站得更高,并将其置于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时刻警示我们的思维和话语。这才是《夜》研究所期待的新方向和新趋势。面对《夜》这一古老的阿拉伯文学遗产,纳吉布·马哈福兹、哲迈勒·黑塔尼、阿多尼斯等一

批阿拉伯文人已经走得很远，他们的经验心得，值得我们借鉴和汲取。同样是“世界文学”，马克思和歌德的立场就完全不同；同样是全球化，中国和西方的立场也迥然有别。所谓“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运大同篇》），我们寻求的是和平共处、平等互利，而非零和博弈。

注释：

- ① 参见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81-83页，以及Ulrich Marzolph and Richard van Leeuwen ed., “The Arabian Nights as an Orientalist Text”, in *The Arabian Nights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04), Vol. 1, 25-28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686页。
- ③ Faḡimah Mūsā, “Alf Layla wa Layla wa Kutu ar-Riḡlāt fi al-Qarni at-Tāsi ‘Ashra”, *Fuṣūl*, al-Hai’ah al-Miṣriyyah al-‘Āmmah li-Kitāb, Vol. 3, p. 230.
- ④ 转引自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廉超群、李海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201页。
- ⑤ *The Arabian Nights: Tales from “A Thousand and One Night”*, trans. Richard Francis Burt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1), p. xxxvi.
- ⑥ Suhair al-Qalamāwī, *Alf Layla wa Layla*, Dar al-Ma‘arif bi-Miṣr, 1959, p. 299.
- ⑦ Suhair al-Qalamāwī, *Alf Layla wa Layla*, p. 298.
- ⑧ Ilyās Khūrī, *Adh-dhākīrah al-Mafqūdah: Dirāsāt Naqdiyyah*, Beirut, Dar al-Ādab, 1990, pp. 153-159.
- ⑨ 参见余玉萍《阿拉伯当代文学的转型与嬗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203页。
- ⑩ 参见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298-313页。
- ⑪ Najīb Maḡfūz, “Alf Layla Ahāḡat bi-Ḥaḡ ṭrah ash-Shrqiyyah”, *Fuṣūl*, 1994, Vol. 3, p. 387.
- ⑫ 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薛庆国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166页。
- ⑬ Ibrāhīm Abd al-Azīz, *Anā Najīb Maḡfūz: Sīrah Ḥ ayāt Kāmilah*, Miṣr: Naḡr li-n-Naṣr wa at-Tawzī‘, 2006, p. 153.
- ⑭ Najīb Maḡfūz, “Alf Layla Ahāḡat bi-Ḥaḡ ṭrah ash-Shrqiyyah”, *Fuṣūl*, 1994, Vol. 3, p. 388.
- ⑮ 参见Wen-Chin Ouyang, “Whose Story Is It? Sindbad the Sailor in Literature and Film”, in *New Perspectives on Arabian Nights*, eds. Wen-Chin Ouyang & Geert Jan van Gelder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7-10.
- ⑯ Ferial Ghazoul, *Nocturnal Poetics: The Arabian Nights in Comparative Context*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1996), pp. 134-149.
- ⑰ Rā’id Muhammad Nūrī, “al-Burjuwāziyyah al-Aurubiyah fi Alf Layla wa Layla min 1704 - 1885”, <https://www.ahewar.org/debat/show.art.asp?aid=542061>.
- ⑱ 参见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三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林丰民

sy literatur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p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or psychology, which analysed in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fear and fantasy literature, scholars also explored the origin of fantasy fear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ntasy genre and discours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works of four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of fantasy fear studies, and illustrates the transformations and shifts in perspectives of fantasy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ttite Literature

LI Zhe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ittite civilization was based on the study and assimil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and some other neighboring cultures. As a group of immigrants, the Indo-European Hittites borrowed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 translated some other texts writte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into Hittit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also adapted some literary works, which were of foreign origin, to a new Hittite versio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thoughts. Thus, they created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develop their literature, and this became one of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 C.

***The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in the Wave of Nationalism**

ZONG Xiaofei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ranslated into French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as provided opportunities and materials for European literature to change from classical literature to romantic literature. The way Eastern countries were shaped in numerous variants also meets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nee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and in the colonial expansion process in Europe. Furthermore, the process of its return to the East is a doubtless ref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end of nationalism in the Arabic world.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his process by presenting and analyzing various aspects of its renewal in the Arabic world, and expresses opinions on som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Lukianos' s Shift from Rhetoric to Philosophical Dialogue with a Comedian Mask

CHENG Qianwen

In his work *Double Indictment*, Lucian described his shift from rhetoric to dialogue, the son of philosophy. The dialogue was combined with the old comedy. Why did Lucian abandon rhetoric and turn to philosophical dialogue? Why and how does this philosophical dialogue put on the mask of comedy? This reveals the rhetorical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philosophy at that time, and also reflects Lucian's discrimination of rhetoric and philosophy. On the basis of this consideration, Lucian chose his own way of writing and became a well-known satirical writer, who was imitated by many later writers.